



# 中国乡村

与墟镇神圣空间的建构

劳格文 科大卫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中国乡村

与墟镇神圣空间的建构

劳格文 科大卫◎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鸣 谢

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计划资助本书各章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蒋经国基金会亚太汉学中心资助本书出版，谨此致谢。

## 作者服务单位

- 张小坡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吴欣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韩朝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刘劲峰 江西省赣州市博物馆（退休）  
吕永昇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贺喜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潘艳勤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  
马木池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劳格文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科大卫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序 论 ..... 劳格文 科大卫 / 001
- 第一章 明清以来绩溪县竹里信仰空间的建构与民众  
祭祀生活 ..... 张小坡 / 024
- 第二章 村落空间与民间信仰  
——明清山东东阿县苦山村的民间信仰 ..... 吴 欣 / 043
- 第三章 “世宦之里”  
——山西定襄北社村的士绅与祭祀空间 ..... 韩朝建 / 064
- 第四章 村落的空间建构：江西宁都东龙村  
个案研究 ..... 刘劲峰 / 114
- 第五章 法术的庇佑：湘中冷水江苏姓村落的  
仪式与地理空间 ..... 吕永昇 / 153
- 第六章 祭祀空间与地域社会  
——雷州雷祖祠及其周边乡村的灵物、  
神庙与祠堂 ..... 贺 喜 / 188

第七章 金龙布傩的村落、信仰与仪式空间

——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横村的

“求务”为例 ..... 潘艳勤 / 231

第八章 边缘群体的认同：19世纪广西边境上

以“亭”为中心的“京族”社区 ..... 马木池 / 248

## 图表目录

图 1-1 竹里信仰空间布局 .....	034
图 2-1 苦山村古地图 .....	062
图 2-2 苦山村古地图指引 .....	063
图 3-1 北社村及其附近 .....	067
图 3-2 北社村祭祀地点分布图 .....	074
图 3-3 李氏世系 .....	080
图 4-1 东龙村示意图 .....	115
图 5-1 双江庙的祭祀村落 .....	156
图 6-1 雷祖祠及周边陈氏乡村相对位置 .....	189
图 6-2 雷祖谱系简略 .....	191
图 6-3 亿年村祭祀点 .....	193
图 6-4 西边村祭祀点 .....	196
图 6-5 夏井村祭祀点 .....	198
图 6-6 井园村祭祀点 .....	201
图 6-7 白院雷祖祠、英山雷祖诞降地、麻扶雷祖公馆 相对位置 .....	205
图 6-8 英山村雷祖诞降地 .....	206
图 6-9 英山陈氏世系 .....	211
图 6-10 《雷祖志》所绘《乌仑山图》 .....	216

后，竹里便一直保持着稳定发展的势头，周氏宗族的脉络也一直没有中断。竹里周氏仅是徽州上千个村落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宗族，与汪氏、程氏、胡氏等徽州其他故家大族相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上都无法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周氏仍然能够保持千年基业。检视竹里周氏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周氏曾出现了对于宗族制度建设做出一定贡献的成员，他们对竹里村落空间的建构出力尤多。这样一个并不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或许代表了徽州湮没在历史深处众多村落的发展轨迹。历史并不是全部由宏大叙事构成，真实的历史往往体现为琐碎的平凡。

在明清徽州宗族社会中，宗族会社扮演着无处不在的角色，它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地方各种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代代赓续，相沿成俗。但是，从竹里数量繁多的庙宇和会社活动，可以看到做会与周氏宗族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会祭”以其组织化、规范化的运作，远胜于传统的宗族祭祀形式。透过文书我们也不难看出，频繁的会社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周氏沉重的经济负担，但他们却通过种种变通方法维持会社活动的正常开展，在现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会社活动往往也就成了彰显宗族实力与巩固宗族在地方社会位置的一种体现。

## 第二章 村落空间与民间信仰

——明清山东东阿县苦山村的民间信仰

吴欣

山东省东阿县苦山村是一个多姓村，主要由一刘、二李三族组成。该村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家谱、碑刻等资料，最为可贵的是一部由村人李濠创修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的《苦羊山志》。该书虽名为山志，实又为苦山聚落的村志。此志也未被公私收藏，本文所引用者为民国5年的手抄影印本。

### 苦山村的空间坐落

苦山，因“峦峰层叠有苦盖形”<sup>①</sup>而得名，位于山东省东阿县西南部。明万历朝于慎行修《兖州府志》载：“苦山，在城（东阿县城）西二十里，平地一丘，状如螺旋。”<sup>②</sup>《苦羊山志》云：“去山不里许，居民繁衍，更筑数十舍，自为聚落。”<sup>③</sup>依山而居形成

① 李濠：民国5年（1916）的手抄影印本《苦羊山志》自叙。

② 于慎行：万历《兖州府志》卷三《山水志》，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本，齐鲁书社，1984年影印本。

③ 李濠：《苦羊山志》卷二“驻岱山阳创建三圣祠记”。

的聚落亦名苦山。苦山东为大清河，西为京杭大运河之会通河段，南五里，为小盐河。

苦山处于黄河冲积平原上，西边的大运河及东部的大清河皆可给其提供丰沛的水源。但是，由于黄运关系的复杂性，这一区域所受水灾极为频繁。京杭运河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命脉，明、清“保运”漕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运河沿岸区域利益为前提的，为运河提供水源的黄河的漫溢及改道给沿岸农业造成极大破坏。李濂《苦羊山志》详细记载了苦山在明代被灾的情况：“弘治二年，河没安平，苦山被水”。<sup>①</sup>关于这次水灾，《明史·河渠志》中有载，黄河冲毁张秋沙湾运河堤岸，“掣运河水入盐河（大清河），漕舟尽阻”，<sup>②</sup>“决口奔猛，戒莫敢越”。<sup>③</sup>时任都察院副御史刘大夏通过在决口上游开新河、疏浚旧河、加筑水坝等方式使河口得到治理。其后，黄河之水对于此段会通河没有造成大的威胁。但明清易帜之时，长期战乱，运河失修，清初，黄河决溢危及运河的事情时有发生。顺治七年，河决荆隆口，“张秋以下堤尽溃，自大清河东入海。”<sup>④</sup>道光《东阿县志》中记载了清代该地区遭受水灾的情况：“雍正八年（1730）水患”；乾隆十一年（1746）八月十七日，“南河水溢，有发水被淹之州县”；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初二，“今山东滨河州县因堤岸漫溢不无被溺之处”；嘉庆十八年（1813）五月十四日：“东省沿河州县漫水受浸，小民荡析离居。”<sup>⑤</sup>民国《东阿县志》则记述了咸丰朝及其之后黄河改道对该地的影响：“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于铜瓦厢，东流张秋入东阿境，挟汶水穿运河占小盐河夺大清河至郭家口，经本境八十余里，运道大坏，

漕船阻遏不行，而沿河两岸居民田畴庐舍淤没殆尽，荡析离居不堪其苦。”<sup>①</sup>

苦山在运河西十五里，<sup>②</sup>离运河沿岸繁华的商业市镇张秋镇仅三十里，运河带来的商业气息也影响到这一村落。苦山是该区域的集市，“逢一六日为集期”。<sup>③</sup>就现有资料来看，苦山在明代是否已经是集市不得而知，但至迟至康熙时期，它已经是当地的中心集市。<sup>④</sup>苦山的主要街道为贯穿东西的中心大街，该街东西分别通往老县城（现在隶属于平阴县的东阿镇）和东阿县县城，各类店铺和手工作坊沿街设立，为周边村落的经济中心。

在行政区划，明清两代，苦山隶属于东阿县，明万历朝于慎行编《兖州府志》记曰：“洪武二十五年，天下草创，民数未均。于是徙登莱等处民数千家，听其开垦荒田，以为永业，谓之屯民。而社民亦有。徙者不详其始，所以异今其乡社。旧域颇有其人，聚居要之参错者，众不必各守其里。而‘六乡之法’其后稍变，则以一乡统四里，谓之六乡已。”<sup>⑤</sup>苦山即属于东阿县六乡二十四社之尚德乡路疃社。<sup>⑥</sup>明正德七年（1512）邑人苏则曾在《重修石佛寺记》中说：“环山而居者无虑数百家，多缙绅鼎族”；<sup>⑦</sup>康熙《张秋镇志》也记载：“东北为东阿之路疃社，其聚居曰苦山集，去镇三十里，风气颇佳，多士族，厥田肥饶。”<sup>⑧</sup>清道光朝，东阿县分五乡，

① 李濂：《苦羊山志》卷一二“灾掣运河水入盐河（大清河），漕舟尽阻伤”。  
② 张廷玉：《明史》卷八三《河渠志》，中华书局，1976，第886页。  
③ 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一二〇，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1011页。  
④ 《清史稿列传》卷二七九《杨方兴传》，明文书局，1985，第10109页。  
⑤ 道光九年《东阿县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第92册，凤凰出版社等，2004，第17页。

① 民国《东阿县志》卷三《舆地二》，《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六三号》，成文出版社，1976，第91页。  
② 李濂：《苦羊山志》卷四《山水》。  
③ 民国23年《东阿县志》卷一《舆地》，第47页。  
④ 最早记载苦山为集市的是康熙《张秋镇志》，由于缺乏资料的记述，我们并不清楚苦山在明代的情况。  
⑤ 刘沛先原修，郑廷瑾增修，苏日增纂康熙五十四年（1715）《东阿县志》卷四“里甲”。  
⑥ 于慎行：万历朝《兖州府志》卷二《建置志》，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本，齐鲁书社，1984年影印本。  
⑦ 李濂：《苦羊山志》卷八《艺文志》。  
⑧ 康熙《张秋镇志》卷一《方域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9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等，第30页。张秋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岸的中心集镇。



苦山村为谋道乡十一里苦山村，村设甲总2人，保正1人。<sup>①</sup>民国初年（1913），苦山村一分为二，以中心为界，居东者为东苦山村，居西者为西苦山村。1965年，前苦山又从西苦山分出，成立大队。<sup>②</sup>由此成为东苦山、西苦山、前苦山三个自然村。据村志记载：1981年三个村子的人口数量分别是1629口、1198口和1058口，<sup>③</sup>其中东苦山村人口相对较多，其余两个村子基本持平。

### 族群构成

苦山的行政划分与地理空间与本村三个大姓氏的居住空间相契合，东苦山为刘氏宗族所居，西苦山为洪洞李氏居所，前苦山为登州李氏的聚落。（为了便于区别，按照其迁移地将二李分别称为洪洞李氏和登州李氏）<sup>④</sup>关于三族的来历，家谱中各有记载。刘氏家谱创修于明弘治元年（1488），家谱载：“吾刘氏之得姓，虽远祖于陶唐氏，而近宗于汉沛公，皆漫无可考，迩自宋元屡遭兵燹，忧乱更迭；逮元季不德，僭伪肆起，干戈扰攘，臣民窜徙，频年未息；至我国初，仅安集耳。”<sup>⑤</sup>此段记述笼统地说明了其“原居民”的身份。同时家谱对“东阿生继刘氏者，肇自陶唐炎汉，为名家国族，谱牒详尽，想无脱逃。逮自中叶兵燹屡厄，子孙散处”<sup>⑥</sup>的追忆，也旨在强化其“正统”的祖源与身份。

家谱所记，刘氏一世祖生活于宋元之间，“寂寂无闻”。<sup>⑦</sup>“鼻祖家境尚贫，纨裤子弟郁府君、三世祖思明府君赋性忠朴，惟乐耕

① 苦山村志编纂委员会编《苦山村志》，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印制，2006，第17页。  
② 苦山村志编纂委员会编《苦山村志》，第28页。  
③ 苦山村志编纂委员会编《苦山村志》，第58页。  
④ 有关苦山村氏族的历史，可参考吴欣《宗族与乡村社会“自治性”研究——以明清时期苦山村村落为中心》，《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7~159页。  
⑤ 弘治二年（1489）刘氏家谱《传刘氏家乘世系》。  
⑥ 弘治十五（1502）年续修刘氏家谱《东阿刘氏宗谱后序》。  
⑦ 李濂：《苦羊山志》卷六《人物》。

耘，事勤俭，故饶裕。值四世祖珽府君始有功名，为明宣德三年（1428）岁贡，历官善心临晋县儒学教谕。其后，诗书传家，录科考、登仕宦者接踵而至，代不乏人。”<sup>①</sup>据族谱《世表》：一世柴公之下为二世郁，三世为思明、致中、三公。三世开始分支，思明一支有子三，珽为长子，始入科举，为临晋县教谕。刘珽有五子，分别为观、宽、信、敏、亨。其中刘亨为弘治元年（1488）昌黎县县丞；其子刘继为弘治十三年蓟州学训。但真正使刘家成为望族之家，功在五、六二世之同门三进士，他们分别是五世刘约和他的两个儿子刘田、刘隅，<sup>②</sup>三父子科举成功，同朝为官。至此，刘氏宗族的声望显赫、势力增强，成为当地之望族。其后，刘氏“入成均游泮宫者代有其人”，<sup>③</sup>他们或为地方小吏，或以书院授业为生。正因为如此，万历朝大学士于慎行（刘田外孙）在给刘隅所作《墓表》中说：“吾邑文献以刘氏为冠冕”。<sup>④</sup>在一个聚落之中，如此连续的文脉积累，为刘氏赢得大族之名显见矣。

登州李氏，从明初一世祖至二世、三世亦无功名，“曾大父玘，大父夔皆隐而不士。父颖……故侠士，好客喜游，家殖中落”，<sup>⑤</sup>但从四世李学诗始，科举中第，家道中转。李学诗，嘉靖四十四年

① 1998年《重修东阿苦山刘氏五支家乘序》。  
② 刘约，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二甲进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主事、河南参政等职。正德二年（1507），因裁员离职，不久复职，复任河南参政。致仕归乡后，在东流泉构筑精舍，教授子姓以修世业。所创东流书院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书院之一。刘田，刘约子，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进士，初授北直隶真定府元氏县知县。正德五年（1509）升为户部主事，员外郎，正德十二年（1516）督办漕运，38岁卒于任上。刘隅，刘约子，刘田弟，嘉靖二年（1523）癸未科进士，拜授福建道监察御史，嘉靖七年（1528）为南直隶学政，后历任四川按察司金事、南京刑部郎中、南京宗人府经历、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等职。致仕后，继续承办东流书院。  
③ 宣统二年（1910）《续修东阿刘氏家乘跋》。  
④ 笔者抄录于苦山“通议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范东刘公墓表”。  
⑤ 笔者抄录于苦山，万历九年（1581）于慎行《明故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前峰李公墓志铭》。

(1565) 进士及第，历任山西阳曲知县、开封同知、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司郎中。李学诗个人的宦宦身份与其开创的宗族仕风为李氏成为望族带来了际遇。后世所修族谱中说：“三世祖颖六子，伯祖司马公（李学诗）为时名臣，自是厥后，克开衣冠济济，称阿邑华宗。”<sup>①</sup>

洪洞李氏亦是移民家族。据家谱记载：“祖常公，自陈夏，自号知己。元（原）籍山西洪洞县人氏，式元泰定丁卯（1327）科举人，因乱不仕，自顺帝甲辰年（1364）迁居东阿县苦山庄家焉。”<sup>②</sup>又载：“余族世居陇西，迁居山西亦难祥自何时，迨元末兵起，鼻祖知己公自山西洪洞县复迁于山东东阿苦山庄家焉。”<sup>③</sup>至五世李仁为嘉靖二年（1523）进癸未科进士，李氏子孙始再获功名。李仁，字符夫，号吾西，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李氏宗族中官职最高的族人。

由此可见，苦山三族，刘氏可算作土著，二李则分别在元末和明初落籍苦山。刘氏在明宣德年间开始科举中第，并在正德、嘉靖年间真正成为地方望族，而二李家族均是在嘉靖年间开始入仕，家族势力逐渐发展，并在有明一代于当地形成了“明兴以来，山川效灵，贤哲递起，合邑甲第才十七人，吾乡已以五计矣。至乡贡、才异、忠贞、雄武之俦，辉煌后先，亦云彬彬盛矣”<sup>④</sup>的威望。

## 庙宇的聚合

村人李濠自称苦山村是个“山水汇而灵气呈，其间多绣文纬武之儒、异才绝智之士，自是有忠孝焉，有仙释焉。事业文章之

① 李濠：《苦羊山志》之《李氏家谱自叙》。

② 1956年续修《李氏家谱》卷首。

③ 道光二十三年李氏《续修族谱序》。

④ 李濠：《苦羊山志》卷六《人物》。

大，他乡莫能先焉”<sup>①</sup>的村落。文中的“苦山”是作为一个村落整体而存在的。从成书于顺治十八年（1661）《苦羊山志》的记载来看，苦山村的庙宇共有碧虚观、永济寺、玄帝庙、观音堂、三官庙、关帝庙、石佛寺、土地庙、龙王庙、三圣祠等十座庙宇。其中有些庙宇在明清时期已经不复存在。比如碧虚观，《苦羊山志》载：其“在磨崖碑下，殿宇巍峩，有祷辄应。元中统间重修葺之，后巨寇蹂躏。及此特著灵异，士人争祀之，今废”。<sup>②</sup>而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邑人刘筌所撰《三圣堂碑记》中亦说：“往胜国时山麓有观曰碧虚，为一方巨伟，岁久湮圯”。<sup>③</sup>永济寺也在明代“被水而湮”。<sup>④</sup>囿于资料和篇幅所限，以下仅对三官庙、关帝庙、石佛寺、三圣祠的存废做时间和空间上的梳理。（庙宇之地理位置见图2-1、2-2）

石佛寺，在苦山西南里许（前苦山村内），创建未知何时。其旧制“外为山门，山门内有古槐、精舍、波罗井。中为如来殿，殿后有净慧阁。如来殿前列伽蓝、地藏二殿。顺治七年（1650）荆隆口决，大河北徙，止余如来一相。”<sup>⑤</sup>石佛寺是明清两朝《东阿县志》所记苦山唯一被提及的寺庙。该寺之所以名曰石佛寺，是因为“庄严宝相，非土非金，非大旃檀，以青玉石造成。”<sup>⑥</sup>而关于石佛寺建立的最早年代，后世均不可考，但是在《苦羊山志》中有一首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科王用中进士书写的“石佛寺有王右军书”诗。诗中提到：“寺野僧残涧水余，北风垂落鬓毛疏。三乘无着参金象，五竺随缘响木鱼。病獫解传摩羯偈，警口犹见右军书。空门回首人间路，劳犹

① 李濠：《苦羊山志》自叙。

② 李濠：《苦羊山志》卷五《神祠》。

③ 笔者抄录于东苦山，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圣堂碑记》。

④ 李濠：《苦羊山志》卷五《神祠》。

⑤ 李濠：《苦羊山志》卷五《神祠》。

⑥ 笔者抄录苦山石佛寺，万历二十二年（1594）《新修石佛寺记》。

何如此静虚。”<sup>①</sup> 此处所言“右军”是否是指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尚难考证。

至今，石佛寺内仍保存着明正德七年（1512）和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两通碑刻，约略记载了该庙在明代重建的事实与神异故事。正德碑记曰：

初建国之二十四年（1391），为洪武辛未，爰敕所自，清理佛教，汰其衍盘宗风者，俾供赋税。凡招提所建，相毗或教区归并于一为丛林。惟时我东阿石佛寺与焉。<sup>②</sup>

而谈及这座寺院被留下来的原因，时人苏则曾认为：

寺距城之兑半舍有奇，据苦山之胜。环山而居者，无虑数百家，多缙绅鼎族，雅崇礼教。每值岁时伏腊，洎圣寿之辰，必会众拜祝其内，以罄臣庶涓埃之私，匪徒修敬于佛也。<sup>③</sup>

之后，因石佛寺的建设在苦山的低洼之处，易被水淹，因此进行迁址。而此次迁址，得到登州李氏的资助，如碑文所记：

前此规模湫隘。檀信因之以增葺者垂六十年，历景泰辛未，住持德祥继之，而规模不减于旧。逮弘治丙辰，乡善士李公恕施地一区，寺遂徙于是。其地袤六十步，广半之，殿宇之制犹草创。继而风雨震凌，日趋于蔽，此光前裕后之责，匪今沙门明添氏抑何赖焉！殿旧两楹，拓而为五；佛相三尊，饰以金碧；罗汉二九，合以翠龕。壁塑文殊、普贤及诸天，对塑

① 李濂：《苦羊山志》卷五《神祠》，即“十五里”。

② 笔者抄录前苦山石佛寺，正德七年（1512）《重修石佛寺记》。

③ 正德七年（1512）《重修石佛寺记》，“兑半舍”即十五里。

观世音，相位东西对峙。伽蓝、祖师殿各三间，天王殿、山门如其数。后列丈室五间，禅房倍之。缭以重垣，涂以丹雘。经始于庚午春初，落成于壬申秋暮。添师及地主恕之子铭、檀信王琳丐予为之记。<sup>①</sup>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于慎行复有关于该寺的刻记，碑文所记故事如是述曰：

隆庆六载，岁在壬申（1572），毗邪居士住谷城山，偶一行役，过此佛宫。忽有痾病厄，痛苦呻吟，五体卧地，不能自起。其从行人致诸药品，种种医疗，不能愈。此时居士不胜痛苦，因自念言：‘当尤此身，未有生时，本无四大与六根尘。指爪发肤或所未有，则此痛苦又安从生？当其未有，本非真无；则既有生，亦非真有；既非真有，何名为痛！譬如梦中，欢喜悲愁，疾痛烦恼，无所不有。若使有人于其梦中推之使悟，则此悲欢种种情识忽然无有。梦既无有，觉从何立？毕竟梦觉，皆非真际。’作是思惟，即见如来于白毫端放大光明，微尘刹土无不照见。而此居士忽然安乐，凡所痛苦，一时解脱，乃至平生所有障碍俱得开解。如居火宅众苦所烧，而遇法雨忽然投出，得清凉境。尔时（指隆庆六年——引者注）佛宫有大比丘，名曰如潮，及弟子妙金，修行如幻，三摩钵提，以善因缘，度无量众。皆舍所爱及诸结习，献财効技以作佛宫。月历庚辰，厥功告竟。<sup>②</sup>

故事以石为记，进一步说明了石佛寺的神力，同时也明确了该庙再次被修缮的事实。

① 笔者抄录前苦山石佛寺，正德七年（1512）《重修石佛寺记》。

② 笔者抄录前苦山石佛寺，万历二十二年（1594）《重修石佛寺记》。

但时至清代，“一方士庶，共所瞻仰”<sup>①</sup>的石佛寺却毁于水灾，“顺治七年（1650）河决荆隆口，寺倾于水”。<sup>②</sup>其后有关石佛寺的记载便不见于书，只是2006年编订的《苦山村志》中说清代对石佛寺有进一步的修缮。难道石佛寺就此消失？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之中，但见石佛寺尚有殿宇三间，尽管已经十分破败，但并未消失殆尽。所幸的是在李氏一家户之中，发现了一通民国21年（1932）的《建醮碑记》，碑中记载：

建醮之说不出于经传，而后世盛行者何也？□□东汉张道陵氏祖元始太上之教，创符水禁咒设坛祈祷之法，以通人情于上帝，求降福于民间。而道家宗之，修醮施法以问世，历朝崇之。设醮禳灾以补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之不足，而乡间闾里集众建醮，□□斋礼忏除以禳疫祈福者，其以此欤？然非有诚心好善之士鼓舞提倡，历久不倦，则一乡之善念或息，四方之善事不永，必不能邀天眷、荷福也。李君秉正好善乐施，急人之急，扶人之危，常若不及，有善之目焉。创建醮社，每岁二月二日，纠合四方善士信女于石佛寺修斋祈祷，焚香顶礼，以答神麻，迄今已数十年。虽无霞云结彩、天花散福以示灵异，而一方之人衣暖食饱，安居乐业，无饥寒流离之苦、兵迁徙之灾。<sup>③</sup>

在此，暂且不论道教之建醮如何在佛教寺院中展开，仅就人们聚此而祈祷来看，民国时期石佛寺应该还是该村落民众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笔者在田野访谈中了解到该庙始终有和尚。<sup>④</sup>《苦山村志》亦载：“1943年，在民国三十二年，堂邑闹灾荒，宋登高年少逃

① 道光九年（1829）《东阿县志》卷八《寺观》。

② 道光九年（1829）《东阿县志》卷八《寺观》。

③ 笔者抄录于苦山李姓族人家中，民国21年（1932）《建醮碑记》。

④ 资料提供人为一位九十岁的老先生李玉亭，是现任大队书记的父亲。

荒至苦山石佛寺，拜和尚道然为师，耕种寺田为生。解放后还俗并落户于前苦山村，娶妻生子，曾任前苦山大队干部，1976年迁回老家堂邑。”<sup>①</sup>因此，实际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石佛寺还有宗教活动。

三官庙是位于苦山西部的一座庙宇，其修建时间不详，但至少明万历之前已经存在，正如藏于洪洞李氏族人家中的一通成于清道光三年（1823）的碑刻所记：

苦羊山西偏，旧有□□三官庙一座，亦不详建自何时，自八世祖□虚白公复位重修且创立山门，施庙田二十九亩。□公乐向善事，无沽名钓誉之□，故当时亦无课记。迄今而自□年后，人每言及先人由此盛举不可使其湮没无传。于是，七代孙□□遂约四支人等各输资共立碑碣，以志不朽。是为序。<sup>②</sup>

由李氏家谱所见，李氏八世祖□虚白公生活于明万历年间，因此该庙修建年代应在明中前期，或者更早。从笔者更大范围的田野调查来看，三官庙是这一区域较为普遍的庙宇，其供奉的神仙为天官、地官与水官。正如笔者在与苦山村相邻的斑鸠店所见“重修三官庙碑”中所记：“天地分即显应为太上、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上元天官赐福大帝，中元地冒赦罪大帝，下元水官解危大帝。道贯玄元，德根天地，千旋万化，掌握三灵，照见天下万国九州岛之地，江河湖海之内，浮间世界之中。”<sup>③</sup>据西苦山老人讲，在其年幼时，家族人常至庙中上香，且有本家延请的道士及出资购买的寺产。而今的三官庙虽仍存在，但已经破败不堪。

① 不幸的是，笔者追踪其至堂邑，想进一步了解有关石佛寺的情况，但得到的消息却是该人已经去世。

② 笔者抄录于西苦山，道光三年（1823）《李氏碑记》。

③ 笔者抄录于东阿斑鸠店，明龙飞万历岁次辛丑年（1601）《重修三官庙碑》。

现在位于东苦山村内的“三圣祠”创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目前村中尚留有《驻岱山阳创建三圣祠记》碑,碑文所记如下:

(苦)山之东南隅,去山不里许,居民蕃衍,更筑数十舍,自为聚落,状若山之左翼。苦于祝里无所,乃结社鳩工,辟莱创祠,构堂一字,爰肖三像,殷礼崇拜,而岁时祈报焉。祠曰三圣者何居?窃闻祭法,有功于民则祀,御灾捍患则祀,故每祀必祭土地,谓其为阴阳之冲气而奠居斯民。食货民生所急,泉府之赢缩,司财者操其符焉,故祀财神。若敕封护国忠义关帝,精忠正气,与天地相始终……《尚书》有云:‘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祠成,父老砬石,以垂永永,属言于余。余世为里人,諛拾旧闻,以荐苾芬。上愿也,谨记其大都如左。其工经始于万历乙亥春三月,至庚子冬十二月,略备焉。工不巨而意则诚矣。<sup>①</sup>

关帝庙在运河区域十分普遍,据笔者田野调查所见,几乎每一村落都有关帝庙。正所谓“关帝庙祀遍天下,自通大邑以逮穷乡僻壤异域遐陬,莫不立祠肖像,岁时瞻礼”。<sup>②</sup>现存于东苦山村头的一通《重修关帝庙碑记》也说明了该村关帝信仰的情况。

阿邑西,苦山庄东头旧有关帝庙一座,不知创自何时,仅相传王氏<sup>③</sup>为施主。至乾隆四十年间,刘可公、刘坦、刘清藩曾重修焉。后经黄水,墙壁倾颓,复有刘继宗等慨然重修,各

捐资财以倡于先,募化善信以助其后,鳩工庀材,不数日而功告竣。神像庄严,庙貌威焕,以视向之荒落倾圮者,今则焕然改观矣。以勒诸贞珉以示将来云,是为序。<sup>①</sup>

该碑立于宣统三年(1911),是为重修。碑中特意强调王氏曾经对该庙施以土地,而自乾隆四十年后由刘氏牵头并募资修建。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这座庙宇与刘氏宗族的关系,这种转移也暗示了该庙与不同姓氏之间的隶属关系。

## 苦山族群与民间信仰

从几个庙宇的创建与维护来看,几乎每个庙宇都与宗族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最早始于施舍地亩与参与宗庙事务。

首先来看石佛寺,其在明初裁汰寺庙的政策之下得以保留,且成为苦山村落的共同信仰之神灵。但“逮弘治丙辰(1496),乡善士李公恕施地一区,寺遂徙于是。其地袤六十步,广半之,殿宇之制犹草创。”<sup>②</sup>查阅家谱,李恕为登州李氏家谱中的三世祖。到嘉靖十九年(1540),后任兵部侍郎的李学诗就在石佛寺内的僧舍中办起了私塾,四十年中举之后,他仍在石佛寺内执教且举业。<sup>③</sup>据李濠《苦羊山志》自叙中,他也是“八岁从族祖读书石佛寺。”<sup>④</sup>所以,此时的石佛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登州李氏的私塾。

当登州李氏凭借其族人对石佛寺的施舍而以庙为族内私塾的时候,刘氏已经在不远处的东流泉边建立起了精舍。明成化二十三年

<sup>①</sup> 笔者抄录于东苦山,万历二十七年(1599)《驻岱山阳创建三圣祠记》。

<sup>②</sup> 笔者田野调查所得光绪十年(1884)聊城博平镇《重修关帝庙碑记》。

<sup>③</sup> 该姓氏在本村已经不存在。关于其消失与迁移的原因尚不明确。

<sup>①</sup> 笔者抄录东苦山,宣统三年(1911)《重修关帝庙碑》。

<sup>②</sup> 笔者抄录前苦山石佛寺,正德七年(1512)《重修石佛寺记》。

<sup>③</sup> 顺治十八年(1661)《李氏族谱》卷首。

<sup>④</sup> 李濠:《苦羊山志》自叙。

(1487), 刘氏族刘约进士及第, 为南部稽勋主事。第二年父亲去世丁忧期间, 开始在东流泉附近购地构筑精舍, 培养学生。正德二年(1507), 时为河南参政的刘约又因为参劾刘瑾被贬为平民, 归乡后亲自在东流精舍授业, 其间洪洞李氏的李仁就肄业于此。嘉靖元年(1522), 诏毁淫祠, 东流泉附近原有的洪福寺被毁为乡社。<sup>①</sup> 刘约之子刘隅以及李仁共同上书抚台陈凤梧, 欲将洪福寺与精舍合并改为书院。陈凤梧纳之, 并在刘隅、李仁举进士后, 亲自书写“东流书院”匾额。之后, 刘隅又进一步买地构建书院, 且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罢官之后, 又买百亩田产作为书院学田。书院依秀山傍幽林, 风景颇佳, 各地名人来此者不绝, 题咏甚多。<sup>②</sup> 其中刘约的一首“示隅儿东流精舍读书”, 表达了其对后人的看重: “怜渠苦志远尘粉, 卜筑山房傍水滨。视草池边香返藻, 谈经洞口气凌云。囊中无物吾何虑, 架上传书喜有人。待得凤麟呈端日, 明年秋里后年春。”<sup>③</sup>

刘氏作为土著宗族, 其自始就建立起了相对充足的地缘优势, 这种优势不仅表现在一家三父子同朝为官的势力之上, 而且从宗族建设的角度, 刘氏宗族早在弘治元年(1488)就创修了家谱, 并于其后修建了家庙。时任吏部政福闽莆田梅坡许翰彦在为刘氏祠堂所作的《刘氏家祠鼎新堂记》中曰:

春秋修砌祖庙……古者四时有祭, 三月无君则吊, 备载仪节, 家礼昭彰, 有目者借可睹。惜人心易私而难公, 道心难明而易昧。东阿刘永之氏者, 明理之士, 独见于此……万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 不知报本之礼者, 曾豺狼獯之不若,

① 洪福寺即东流书院的前身。据道光《东阿县志》卷二《祠祀》记载: 该寺“在县东南十五里, 东流泉水环绕。邑之圣地也。明嘉靖初奉诏改为东流书院。”

②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各类人等咏东流书院的诗有十五首之多。

③ 李濂:《苦羊山志》卷七《艺文》。

禽兽之不如, 佳儿安在哉! 吾知永志始, 必随基广狭, 因才仑奂, 栋宇为之隆固, 墙壁为之周遭, 木主森列而昭穆不紊。凡刘氏之宗, 生忌、时祭有所革; 刘氏之胤, 嫁娶、生育有所告。时思不替, 孝心融融……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未必不自此举始。<sup>①</sup>

由这段文字可知, 刘氏祠堂的修建在当时当地是较早的, 即文中所说“东阿刘永之氏者, 明理之士, 独见于此”。从常建华先生的研究所知, 宗祠设立时间普遍是在嘉靖年之后,<sup>②</sup> 但刘氏在弘治十五年已建立起祠堂。尽管从上述碑文资料中我们并不能清楚祠堂奉祀的是高、曾、祖、祢四代神主,<sup>③</sup> 还是突破了这种限制, 将奉祀对象扩展到四代以上的祖先以至始祖, 但这至少表明了刘氏家族士大夫“敬宗收族”强烈的家族意识与经济实力的增强。

宗祠既是宗族的象征, 又是祭祀的活动场所, 起码维持到20世纪。祭时“俎豆森严, 衣冠整齐, 尊卑长幼, 秩然有序……言毕, 祖孙各欢颜而退。”<sup>④</sup> 尽管刘氏宗祠在创修之初仅有正堂, 无“配房、大门仪文度数之伟观”,<sup>⑤</sup> 但作为宗族的象征, 显示出有别于他族的地位。

登州李氏家谱的正式修撰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创修者李濂认为其家谱不修的原因是: “有幸聚庐处者, 止是一村落小户……何有谱牒迹矣。”<sup>⑥</sup> 作为移民家族, 落籍之初李氏并不具备与刘氏一样的地望, 而四世祖李学诗及其后辈在科举入世后也并未行编著家谱之功, 直至明末, 族人李濂始在“万历朝因询族长之

① 弘治十五年(1502)许翰彦为刘氏祠堂所作《刘氏家祠鼎新记》。

② 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第417页。

③ 《明史》卷五二《礼六》; 万历《明会典》卷九五《祭祀·品官家庙》。

④ 宣统二年(1910)《刘氏宗祠拜谱记》。

⑤ 笔者抄录于刘氏家庙, 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氏祖塋祭田宗祠地基宗志》。

⑥ 顺治十八年(1661)《李氏族谱》卷首。

有道者，得十有五世，叙其梗概。”<sup>①</sup>但族谱却并未因此成就。崇祯十三年（1640）李氏家族因族人李沄的劫狱事件而遭遇牵连，族人大都逃亡，李氏家族面临毁族之灾。<sup>②</sup>关于此，李濠在家谱序中这样说：“崇祯庚辰辛巳后，天发杀机流亡无算，幸生其间者计保一息之残喘固难矣，何有谱牒？清之庚子生气渐复，又就所观记者修之。”<sup>③</sup>至于其家庙的修筑，已是清宣统年间的事情。

三官庙现在位于洪洞李氏所居住的西苦山村内，由前述“李氏碑记”所示，“旧有三官庙不详建于何时”，但自“八世祖口虚白公复位重修且创立山门，施庙田二十九亩”之后，该庙便在一定程度上被标记上了李氏的烙印。笔者所访谈的西苦山的老人，都称这座庙为“李家庙”。实则笔者在一位李姓老先生的指引之下，找了曾经的李氏家庙，并见到其庙碑——修建于宣统三年（1911）的“东阿李氏创修宗祠记”。碑中言及，族人卖掉了族园中的树木，“修理祠堂三间垣墙一周”。<sup>④</sup>由创修可知，该族家庙的修建是在宣统三年。

实际上，洪洞李氏家谱的创修时间并不明确，后世族谱修纂者曰“谱启修未详何时”，<sup>⑤</sup>道光二十三年续修的族谱中还说：

原有谱，但旧所记仅代数、名号、父子祖孙、伯叔仲季，条分缕析者无有焉。闲尝展谱一贯，父之行，祖之行，高曾之行，作为之迹，性情之渊微，固以见闻而知之悉矣。至若五服外，孰为旁藁，品格之孤高，风雅学问之造诣纯粹？当时所建

① 顺治十八年（1661）《李氏族谱》卷首。

② 李沄，李濠同族兄弟，崇祯六年（1633）癸酉科武举，九年丙子恩科武进士，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因解救族人劫东阿狱，被通缉远遁云南。整个家族受其牵连。

③ 顺治十八年（1661）《李氏族谱》卷首。

④ 笔者抄录于西苦山家庙，宣统二年（1910）《东阿李氏创修宗祠记》。

⑤ 光绪十九年（1893）《（洪洞）李氏续修族谱叙》。

者何功？奕所传者何训？竟茫无以辨别。<sup>①</sup>

可见其前族谱修纂极其简单，这与刘氏家谱明弘治年间修谱之“参用欧苏谱法以为世系，既又为图录、为世考、为谱传、为祠墓志，皆缘情而起例，因名而演义，详著于篇，以成一家之迹”<sup>②</sup>的编纂体系相去甚远。李氏族谱续修也并不经常，以致“自鼻祖知己公传至吾身仅十五世，而嘉言懿行已亡失无余，甚至长次不能分，子父无由辨，母不知姓，妻不知氏。”<sup>③</sup>至清道光二十三年，十四世李庆余、十五世李海峰等“登各支之林墓，查其碑文之记载，考其所配置姓氏，延访之而始得其详。”<sup>④</sup>因此，民国年间修纂的族谱中说：“二祖（指道光二十年修纂家谱）纂修之功于前为烈矣。”<sup>⑤</sup>由此，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李氏宗族如何凝聚宗族力量，并进而在发展过程中势力上升，成为与刘氏、登州李氏相抗衡的组织形式？此中，三官庙的存在应该是其文化积累与实加强宗族联系重要依赖。在笔者的访谈中，李氏说道：现今每至年节，族人还会至此处上香，也会在有灾难时来此求神。当笔者问起上香的都是些什么人时，对方回答：都是族里的人。显然在他们的心中，尽管现在庙宇已经破败，原来庙里的道士也已经不再，但这座庙宇仍是其李家的“家庙”。

三圣祠和关帝庙都位于东苦山村内，从碑文来看这两座庙宇与刘氏家族关系的建立分别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和清乾隆四十年（1775）。而此时在苦山村已经有石佛寺、三官庙等，而非如碑中所说“苦于祝里无所，乃结社鸠工，辟莱创祠，构堂一字。”而此处所说的“祝里无所”的言辞，是否仅是指刘氏家族的“祝

① 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氏家谱《续修宗谱序》。

② 弘治元年（1488）《刘氏家谱》“跋东阿刘氏家乘后”。

③ 道光二十三年李氏家谱《续修宗谱序》。

④ 道光二十三年李氏家谱《续修宗谱序》。

⑤ 光绪二十年（1894）李氏家谱《续修族谱序》。

里无所”？

在苦山村落的发展脉络之中，我们或可以把族群和民间信仰的历史关系进行如下的重新建构：刘氏宗族因地望之资和为官之望，在明代于聚落之中具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其东流书院的建立以及对族人及其他人群的培养，足以显示其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势力与影响力。而明代的二李宗族与之地位有所差别。他们或是通过三官庙的施舍，实现对宗族的统摄，以提升凝聚力；或者利用石佛寺建于本村的优势和对其的施舍，实现对族人的教育与管理。对刘氏而言，他们对于文化与人才的控制等多在于对东流书院的建设，而且这种更大范围的建设使其影响力和被认可的程度被不断巩固和扩大。入清，三族都面临“及今科第不甚显荣”<sup>①</sup>的境况，宗族之“领成均而入胶庠者”也多只获得了中低级功名，“合邑甲第”的情形不再，三族的差别逐渐缩小。刘氏原有的势力逐渐减弱，其与关帝庙、三圣祠的关系则逐渐加强。

## 余 论

三族对信仰空间的经营和地方性神祇的尊崇，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信仰与被信仰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神与人之间精神世界的交流与碰撞，它同时又是俗世本身自我认识、自我管理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在这一村落之中，信仰成为族群在时空性、知识性和策略性场域中进行建设的手段。在时间的脉络中，不同宗族利用庙宇的空间优势，渐而掌握对庙宇的部分管理权，甚至成为带有家庙性质的公共空间。

遗憾的是，我们在苦山的田野过程中并未得见相关的祭祀仪式。通过访谈笔者也了解到，在苦山，现存的几个庙宇并无庙会祭祀等仪式，对庙神的祭祀只是个人的行为。一位九十岁的老人

告诉笔者，苦山人赶庙会看戏都去附近的关山、阿城和鱼山，而这几个地方是距离苦山不远的几个乡镇政府的所在地，其中一个甚至是在阳谷县境内。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研究认为，在南方“有势力的宗族开始支配着社庙祭祀戏剧的组织 and 财政，因为江南乡村是大姓垄断的同族村落。因此，乡村戏剧随着社会的安定，被置于宗族统治之下；而在小姓、杂姓村落较多的华北，不存在能够独立掌管乡村祭祀的宗族。”<sup>①</sup>这样的结论背后或许还存在另一种事实，即在多信仰的村落之中，不同的宗族掌控着不同的信仰，而这些杂姓的小的宗族组织各自不断强化着本宗与庙宇的关系，将信仰的边界界定得相对清楚，并一定程度将其看做是宗族的家庙。

庙宇的宗族“私有”性还表现在庙宇的名称上。笔者在山东西部运河区域所作的田野调查中，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即庙宇被冠以家族之名，并且这种情况因相沿而成习。例如据民国16年（1927）《济宁直隶州续志·艺文志》之《重修七圣堂碑记》载，“庙为清初始建。据此，建村当早于清初。因傅姓居多，故名傅家庙”。在苦山附近的关山，其村落中的观音堂又名贾家庙。在苦山村落之中，似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民间信仰以族群关系为归依；宗族的敬宗收族则以信仰为手段。宗族组织利用空间优势和施舍等手段，实现庙宇与宗族的结合，强化自身在村落之中的地位，而民间信仰也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延续，成为村落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苦山是一个由土著和移民结合而成的村落，在其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中，各宗族充分利用了信仰文化手段，突出自身的边界。随着时间的演进，苦山村落各宗族对神灵认同的建构是伴随着人口结构重建而发生的。空间上位于东苦山、西苦山和前苦山的庙宇不同程度上成为一刘二李三个宗族的“家庙”。

<sup>①</sup> 光绪十九年（1893）《李氏续修族谱叙》。

<sup>①</sup> 田仲一成著《中国戏剧史》，云贵彬、于允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2002，第27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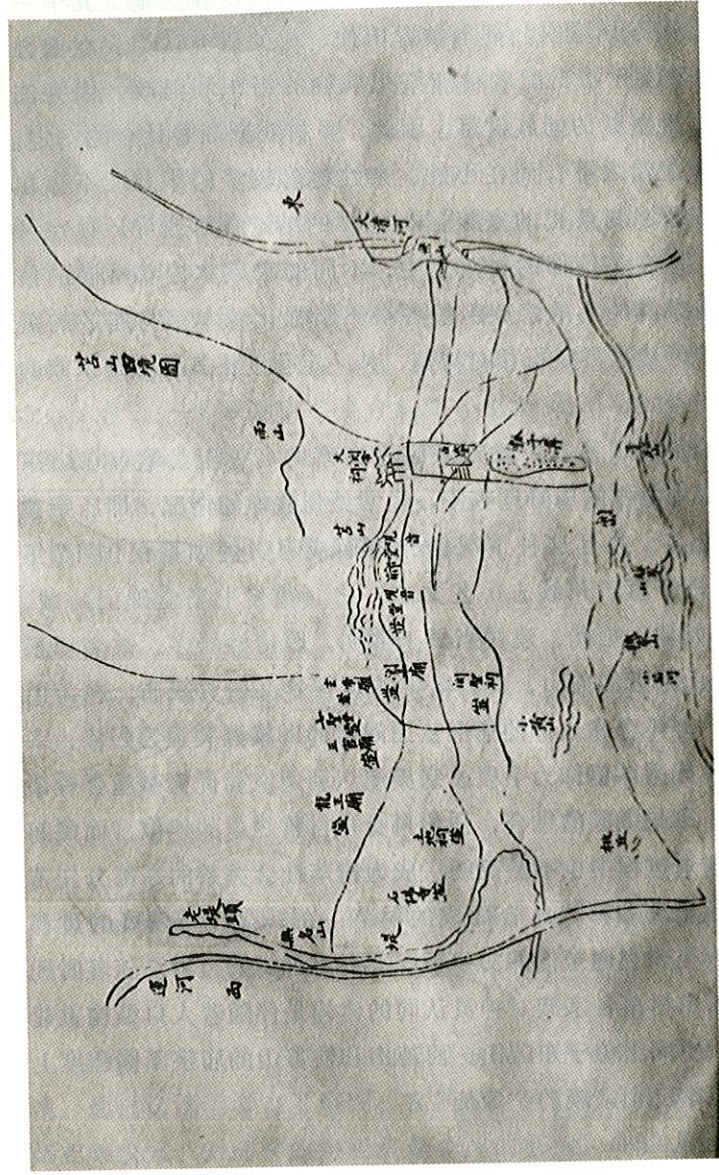


图 2-1 苦山村古地图

资料来源：李滌民国 5 年手抄影印本《苦羊山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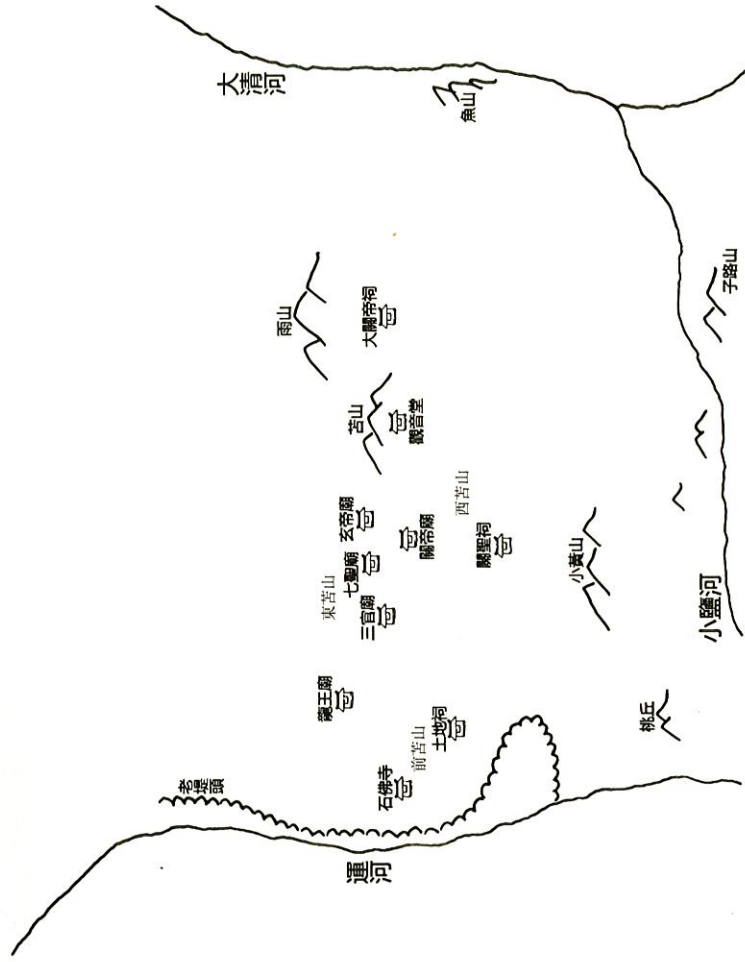


图 2-2 苦山村古地图指引